

# 胡风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 风 论 集

文振庭 范际燕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晓 白

责任校对：沙 湖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李玲玲

## 胡 风 论 集

文振庭 范际燕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经 销 处

新 春 印 刷 厂 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2插页 328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004-0935-4/I·95 定价：6.00元

## 目 录

|                        |               |
|------------------------|---------------|
| 暖日春时解“死结” .....        | 范际燕 (1)       |
| ——对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初步检视       |               |
| 尚待重新评说的珍贵遗产 .....      | 罗 洛 (15)      |
| ——胡风文艺思想评论             |               |
| 现实主义的沉思 .....          | 顾征南 (20)      |
| ——读胡风文艺理论的一些体会         |               |
| 胡风现实主义特色论 .....        | 季水河 (31)      |
| 胡风与二十世纪中国现实主义 .....    | 周 勃 达 流 (47)  |
| 面对历史：超越与限制的二难境界 .....  | 李俊国 (69)      |
|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胡风文艺思想    |               |
| 论胡风与周扬的现实主义 .....      | 胡 铸 (88)      |
| 胡风与“先锋文化” .....        | 范际燕 钱文亮 (108) |
| 论“自我扩张” .....          | 何满子 (123)     |
| 在历史与价值之间 .....         | 曹菊萍 (137)     |
| ——胡风“主观战斗精神”漫议         |               |
| 在生命意识基点上建构的理论形态 .....  | 许祖华 (145)     |
| ——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与实践 |               |
| 关于胡风的五把“刀子” .....      | 陈 辽 (167)     |
| ——重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       |               |

重评胡风的“三十万言书” .....李 离(182)

胡风论“创作过程” .....曾 卓(191)

——一个提纲式的札记

把一个真实的胡风还给胡风 .....高 嵩(203)

——胡风创作论

做人 与 写诗 .....冀 沅(220)

——重读胡风论诗札记

胡风的诗格与人格 .....贺 捷(233)

——读《胡风的诗》断想

论胡风文艺思想和外国文学的关系 .....张国安(245)

莫把形似当神似 .....张国安(264)

——胡风和卢卡契的现实主义理论错位

胡风和日本 .....(日)千野拓政 平井博(276)

——兼介胡风研究在日本的历史和现状

“含悲抒大憾”，“诗心起剑枪” .....张国光(281)

——对胡风《红楼梦》评赞之评赞

平匀溢美 风格存焉 .....冯学锋(297)

——胡风言语风格探讨之一

## 附 录

对“五把刀子”的一点解释(遗稿,晓风整理) .....胡 风(315)

胡风和我 .....绿 原(319)

关于胡风事件及文艺思想的讨论 .....白 桦(384)

诗人·战士·文艺理论家 .....文振庭(410)

——写在《胡风论集》后面

## 暖日春时解“死结”

——对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初步检视

范际燕

一九六五年，梅志第一次获准探视胡风时，曾按有关方面嘱咐，要胡风“加强思想改造”，“争取早日回家”。胡风说：“关在独身牢房能改造好吗？”梅志感到痛苦，也很为难，于是转而言不及义地说：“你可以检查一下唯心主义文艺思想，这大约为主要问题。”胡风始则瞠然，继而哀声长叹曰：“关于这方面，你最好别过问，这个死结不是我所能解开的！”（见梅志《胡风传》）

胡风用“死结”来形容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所造成的混乱和准确评价他的文艺思想的难度，是非常恰当的。这里面既包含着本人对批判持有保留意见而又诉说无门的苦衷，也有在有生之年估计难于得到解决问题机会的绝望，或许还有希冀学界给予重新评价的期待。我们应当设身处地地体会胡风的这种心情，在贯彻“双百”方针的崭新阶段中，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全面、认真地清理和批判地继承胡风的理论遗产。只有这样做，才是对待一个在新文学史上作过虔诚奉献并取得卓越成绩的理论批评家的公正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开那些简单粗暴的批判在胡风文艺思想问题上所打下的“死结”。

暖日春时，万物勃发，“死结”也会松动。然而松动不等于解决。辨识文艺思想理论的是非，是非常细致的工作，需要下功

夫，需要时间，需要大家来做，需要各种见解相互驳难、相互补充、相互丰富。一朝一夕、大哄大嗡或者靠哪一个人是做不好这个工作的。

—

作为理论批判的参考资料，一九五五年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集》（共六集），集中了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主要的批评文章，搜罗比较完备。这些文章的大部份，立论和论证基本上是慎重、严谨的，今天重读，仍可感受到那种严肃的态度和对于革命文艺的责任感。当然，勿庸讳言，理论的简单化和政治与学术的混淆也是相当明显的。也有些文章，着重于“论证”，胡风文艺思想是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立的。这种意向，在没有波澜的时间流逝里逐渐形成为评价胡风文艺思想的大前提。今之论者，虽然已经开始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而且颇多独到的见解，但在这个大前提面前顾虑重重，欲言又止者，仍时有所见。这是一个叫人挠头的问题。胡风文艺思想问题之所以成为“死结”，这或许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在重庆发生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胡风于一九四〇年十月写了《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争点、和实践意义”作了全面评论，确实有对这场论争作出总结的用意，但结果却成为一笔历史的旧帐，屡被清算，缠绕多时。首先，批判者指出胡风想对这次论争作出总结是僭份。其实，任何一个理论家企图对一场论争作出总结的努力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应该提倡的。这倒是一个容易辨别清楚的问题。然而第二，难于辨别的是，据说胡风的观点与这次论争的背景不甚合拍。

这次论争的背景材料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

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而引起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以期发扬民族形式的作用，提高民族形式的地位。郭沫若发表《“民族形式”商兑》一文，用明确的语言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讨论中的一个基本倾向是着重强调民族形式的重要性，对于形式问题的基本理论原则——内容决定形式有所忽视，向林冰甚至提出民间文艺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这样一个中心论点<sup>①</sup>，并进而断定“五四”兴起的各种革命新文艺都是外来形式的移植，不是民族形式，和中国老百姓无缘，应予否定。向林冰还认为，新形式是从旧形式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这就是他的所谓理论体系——形式辩证法。也有人批评向林冰的观点，但向林冰坚持己见，有恃无恐。后来，和他争论的人又把问题从文艺拉到政治立场上去，暗示他受国民党派遣，阴谋用左的理论来破坏革命文艺。胡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参加论争，后来注意到形势的发展，经过认真考虑之后，遂写下了《论民族形式问题》。

针对向林冰的错误观点，胡风着重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这个基本理论原则，并在这个原则指导下，论述了新形式产生的两种方式：第一，从先进的外民族引来，但必须是在本民族的发展水平达到或将要达到产生那个形式的那个民族的历史水平；第二，从本民族的民间形式中产生，但必须根据本民族新的历史现实和人民生活、斗争的要求来改造那种在以前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那种形式，甚至打破那种形式，用它的碎片来组成新的形式。胡风的这些论述，也许还有一些需要改善或者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他在民族形式问题上，在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也就根本谈不上他的这些

---

① 《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载《民族形式讨论集》。

意见是跟毛泽东文艺思想对着来的。

胡风在批评向林冰时，冒着被误解的风险，指出向林冰的观点错误是不自觉的，剔除了屏入论争的不正常政治因素。向林冰对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甚为感动，并因此而不再坚持他的那些观点。这个效果是很好的。解放后，向林冰恢复了党籍，事情的真正性质也就更清楚了。事实本来就是这么顺理成章，我们有什么理由扭住不放呢！

不可否认，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有关“五四”新文学运动性质的论述<sup>①</sup>显然是错误的。胡风承认这个错误，一九五一年还作过检查，既如此，当然也不能成为扭住不放的理由。

再一个长期解不开的“结”，就是一九四五年他在自己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舒芜的长篇论文《论主观》和他在“编后记”中对这篇论文所说的一些话。

《论主观》发表后，马上招来了责难，表面上是批判《论主观》，实际上是针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等文艺观点，把《论主观》看做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更惹人注目的是，胡风在“编后记”里提到《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句话被人认为是直接对抗延安整风运动，妄图与之分庭抗礼。

事情究竟如何？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舒芜的《论主观》中的“主观”，是哲学本体论上同“客观”对立的一个概念。它虽然可以是某种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但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确实不是一回事。“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创作论的核心，简单地说，它是指作家“锐敏的感受力”，“燃烧的热情”和“深邃的思想力量”。作家具备了这种品格，就能搏取人生，掌握创作的对象。胡风所说的创作对象

① “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兴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学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

不是一般的“客观现实”，而是人，是“活的人，活人底心理状态，活人底精神斗争”；创作的结果也主要是人，即人物形象——人的一切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种种表现。对象和结果都具有“感性”的特点、“感情”的特点，因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创作对象需要象“猎人似地追索”，象“爱人似地热恋”，而活的对象也会“精明老练”地“逃匿”、“反扑”、“东躲西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家没有高扬的“主观战斗精神”，就不能把握创作对象，反映客观现实。胡风简练地概括道：“我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指的作者创作过程中对人物的爱爱仇仇的态度”<sup>①</sup>。这和舒芜的“主观”范畴是不相干的。

第二，《论主观》通过胡风的手在《希望》上发表，有一点偶然性，并不能作为考查胡风文艺思想之哲学依据的可靠资料。关于这一点，只需抄引一段胡风的追忆和说明就清楚了：

……我和他（舒芜）并不认识，是路翎介绍的。他那篇《论主观》；在我抽屉里放了半年之久，我很踌躇，因为我对它无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到编《希望》时，我发表了它。原因是，那以前（我还没回重庆），《中原》和《群众》发表了几篇谈思想问题的文章，是响应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果被认为犯了唯心论的错误，思想界陷入了沉闷状态。舒芜说明，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唯心论），所以得研究“主观”这个“范畴”。他还用哲学上斯大林阶段迷惑了我。我想，可以用这篇文章引起论争来，借以打破沉闷空气，在论争的假象上迷惑国民党的审查官，借以扩大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但我对他这个人 and 论文，都是抱保留态度的，所以在《编后记》里作出说明后，要求读者“不要轻易

---

① 《胡风评论集》（下）第406页

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还着重地指出，如果讨论能够展开，“受赐的当不只作者一人而已”<sup>①</sup>。

这段引文只能证明胡风的动机和态度都是无可非议的，而不是其他。胡风遭到责难后，并不泄气，还是希望能够引起有益的公开论争，他曾一再恳切请求主要反对者写文章，但都遭到了拒绝。《希望》第二期发表舒芜的《论中庸》时，胡风在“编后记”中提出“疑难是好的，它会引起进一步的探求，不够的可以补充，错误的可以纠正”，仍然希望引起论争。胡风在“编后记”中，还指出了舒芜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把“个性解放”和集体主义联系起来的错误，这，当然也就排除了《论中庸》和胡风文艺思想有什么联系。编者根据讨论问题的需要编发文章，这是极其正常也是极其平常的事，而文责却是应该由作者自负的，如果他是自愿发表的话。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能搞株连。

第三，关于《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指延安整风运动，不是指《论主观》这篇文章本身。说“再提出”，是指《中原》、《群众》已经提过而言的。这里似乎不应该产生文字的误解。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舒芜确实是在读了能够找到的一两篇“整风文件”之后才写《论主观》的，他兴奋得很，在“主观想法”上还是想从“当时环境”的情况学习整风，为了反对教条主义。这里似乎也不存在要和延安整风分庭抗礼的问题。至于后来（一九五二年）舒芜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他个人的那些思想情况，那是当时的人们所不了解的。

弄清了这几点，可以有助于解开围绕《论主观》问题给胡风文艺思想所打的那个“死结”。

---

① 《胡风评论集》（下）第404～405页。

## 二

胡风文艺思想的一个更大的“结”是现实主义问题。

现实主义问题是胡风文艺思想理论的核心，也是他一生从事批评理论工作所探求的“中心问题”，前面提到过的论争和批判莫不与此相关连。他对现实主义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总体性的理解。他说：

从我开始评论工作以来，我追求的中心问题是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道路和发展过程。不久，我就达到了一个理解：现实主义的发展是在两种似是而非的不良倾向中进行的。一种是主观公式主义（标语口号文学是它原始的形态），一种是客观主义（自然主义是他的前身）……我认为，现实主义是在和这两种倾向作斗争中发展的，也是非在和这两种倾向作斗争中发展不可的①。

基于对现实主义发展的这种理解，他坚持不懈地反对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

他在一九三六年的《文学与生活》中就批判了“自然主义的倾向”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其后在一九三九年写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中，在肯定抗战以来文艺创作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又指出了当时创作上存在的问题：“第一、是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倾向。”“第二、是繁殖的冷淡的倾向”，“即所谓客观主义了”。“在公式化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过多的壮烈词句，一般结论，但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兴奋，在繁殖化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过多的生活枝叶，事实毛发，但也不能得到真正的实感。”

---

① 《胡风评论集》（下）第407～408页。

他又在一九四二年底写了《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一九四四年四月，他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研究部负责人代表理事会起草了第六届年会的报告《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这个报告的基本观点和某些文字段落都与《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相同（“组成整篇的那理解是我自己的，写成以后也并没有被改动一个字”）。在这个报告中他对抗战文艺运动作了基本估价，他进行估价的基本原则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是否结合，而强调的是主观精神。他把抗战文艺运动划分为三个时期：“童年时期”、“转换期”和“最近两三年开始的”“混乱期”。从总的发展形势看，抗战文艺作为一条战线，“在社会里面行动”，“在总的方向下面团结了”，文艺家的“创作追求”也“为着总的方向动员了”。但是，“童年时期”高扬的主观精神被时代精神所“吞没”，变成了时代精神的“直接的传播者”或“抗战事件”的“直接的报导者”，“转换期”“渐渐开始要求主观的认识作用”，而“混乱期”“注目的倾向”则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或者说“主观公式主义”，其根源是作家的“热情衰落了”。他因此提出的主张是加强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他以为这是现实主义“文艺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对这些意见，黄药眠提出了“质疑”，胡风置之不理，到是年十月，又写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进一步明确提出反对“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的文艺主张。当时国统区的一些党的文艺工作者不同意胡风的意见。一位在重庆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在讨论话剧《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的座谈会上说：“今天大后方所应反对的主要倾向，究竟是标语口号的倾向，还是非政治倾向呢？有人以为主要的倾向是标语口号，公式主义，我以为这种批评本身，就正是一种口号或公式主义的批评，因为他只知道反公式主义的公式，而不知道今天严重的普遍的泛滥于文艺界的倾向，乃是更有害的非政治的倾向。”

① 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王戎写了《从〈清明前后〉说起》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现实主义文艺不必强调政治倾向，只要作家的主观精神和客观事物溶解在一起，通过典型的人物，真实的感受，真实的表现，在作品里就会自然地得到真实正确的结论。他的文章受到邵荃麟的批评以后，又写一篇《“主观精神”和“政治倾向”》进一步发挥他的这一观点。接着何其芳写了《关于现实主义》，批评王戎所依据的理论，最后归结为：“今天这大半个旧中国的文艺上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与此同时，何其芳还写了《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对于“某些朋友”把反对“客观主义”作为主要任务，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九四八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问世，这个实际上是党的文艺刊物的创刊号以“文艺的新方向”为其内容总题，头一篇就是“本刊同仁·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意见》主要针对胡风，认为当前文艺思想混乱主要是“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并不是“客观主义”或“主观公式主义”。《大众文艺丛刊》又接着发表了许多党员理论家的文章，从不同的方面点名批评了以胡风为代表的文艺思想，重点仍然是现实主义和主观精神问题。

从一九四四年十月以后，胡风一直没有写文章公开参加论战。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他才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对“在香港的友人们”“作了回答”，从而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他对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观点。

### 三

#### 《论现实主义的路》和《意见书》中“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

---

①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新华日报》副刊发表讨论《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的座谈会记录时，均未署发言人姓名，只用英文字母代表，讲这段话的是“C”。

的说明材料”是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现实主义问题的主要依据，也是我们现在研究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资料。

胡风所反对的“主观·公式主义”，就是那些在创作中用标准、正确的说教补充生活不足、艺术无力的现象。他主张通过艺术实践、即通过反映现实的创作“斗争”过程，去达到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胡风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高原则”：“通过文艺底特殊机能进行艰苦的实践斗争，通过实践斗争的胜利（现实主义底胜利）达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不要抛弃真实和艰苦的创作实践，用不真实的编造和没有化为形象血肉的政治概念去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四、五十年代的批判者据此断定胡风否定和排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于创作的指导作用，认为这正是反动“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区别的主要标志。

其实，胡风非常重视先进世界观对于创作的指导作用。他认为，作家应当具有伟大的人格，因为这是文学艺术要真实、深刻地反映现实而对作家提出的要求；要达到艺术的真实，又是以深刻地认识现实为前提的；深刻的认识又要以正确的立场做基础。他一九三二年写的《现阶段上的文艺批评之几个紧要问题》，着重强调无产阶级作家要以无产阶级实践立场看待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在批评苏汶时他也曾指出：“没有正确的立场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一九三五年他在《〈大地〉里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大地》<sup>①</sup>的作者虽然在中国生活了二三十年，“对中国农村是很熟悉的”，可是她的基督教徒的立场观点限制了她，使“她并没有懂得中国农村以至中国社会”，结果在题材处理上“就完全让传教士的观点代替了艺术家对于真实的追索了”。这就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胡风认识到作家世界观的缺陷给创作带来了损害。胡风曾经多次说过，“社会科学结论或思想”对于作家把

---

①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写的以中国农村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握生活具有“指导”或“引线”作用。同时他坚定地认为：社会实践“是提高人类认识的主要契机”，“认识的问题绝对不能离开实践而解决”，作家反映在创作中的对于生活的认识，一定要是作家在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真情实感”，哪怕这种认识的实质与社会科学的结论或思想是相同的，但它仍具其独特的、生动的外在形式，象集中、折射出生活光采的一串串露珠，多姿多态，清新宜人，富有艺术的启迪性和渗透力。在作品中照抄现成的思想结论，即便变着法子抄进生编硬造的不同故事中，也仍然是千篇一律，公式化。这虽然省力，但与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已相去遥远。

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的现实主义“忽视了作家的阶级立场对于他的艺术活动的影响”，不要“进步的政治思想和进步的 worldview”，被作为“证据”、引用得最多的是《略论文学无国》（一九三七年）中的一段话：

……如果一个作家忠实于艺术，呕心镂骨地寻求最无伪的、最有生命的、最能够说出他所要把捉的生活内容的表现形式，那么，即使他象志贺<sup>①</sup>似地没有经过大的生活波涛，他底作品也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的真实。因为，作者苦心孤诣的追求着和自己底身心感应融然无间的表现的时候，同时也是追求人生。这追求底结果是作者和人生的拥合，同时也是人生和艺术的拥合了。……如果用抽象的话说，那就是，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底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

**一个尊重现实，尊重历史发展的严肃的艺术家可以通过自己的艰**

① 即志贺直哉，日本的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创作态度极其严肃，颇受日本左翼作家尊重。

苦的艺术实践走向马克思主义。实践是造就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条件。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一个恪守真实性原则的现实主义艺术家通过他的“呕心镂骨”的艺术实践连“补足”他世界观上的“缺陷”都不可能吗？马克思主义是从来不把真诚的艺术家拒之门外的。斯大林说：“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如果他能用高度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了生活真实，他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sup>①</sup>胡风在《意见书》中对上面引述的那段话作了解释，对批判的意见作了回答，最后他强调，“重视实践，忠于实践，我以为，这是具体的党性立场。”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之后再回头看这句话，更觉它的正确和深刻！

胡风所反对的“客观主义”，简单地说，是指创作对客观现实作平面的、冷淡的描写，甚至对生活采取消极、旁观、做假、投机、卖笑的态度。他主张作家对自己所要反映的生活必须有发自内心的强烈的爱憎、明确的是非，必须有代表民众愿望和历史要求的不可抑止的欲望和勇气，即具有“主观战斗精神”，才能进入创作过程，才能写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历来的批判者把胡风的这些意见归结为：“否认现实主义的基础是客观的现实生活”，在创作上“把作者的主观精神看得更根本”，“是反现实主义的”。

“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精髓。它主要不是指作家立场、世界观这些要素本身，而是指作家在生活、创作过程中的独具特色的消化力和主观能动作用。他有时又把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叫做“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握力、拥抱力、突击力”，意思是明确的。据此断定胡风否认客观现实生活是文艺的基础完全是误会，甚至是曲解。在胡风的全部著作中，关于客观现实第一性、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论述太多了，这一直是胡

---

① 《论语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时代出版社版，第197页。